

# “作为社会合理化”的现代化理论

## ——从韦伯到哈贝马斯

刘光斌

(湖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湖南长沙, 410082)

**摘要:** 韦伯在考察工具合理性及其制度化时, 把行为理论和社会合理化理论结合起来, 将社会合理化的过程看成是资本主义现代化的过程, 并展开了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时代诊断, 开启了“作为社会合理化”的现代化理论传统。卢卡奇和阿多诺延续了“作为社会合理化”的现代化理论传统。其中, 卢卡奇吸收了韦伯的合理化理论, 他从形式合理性出发, 把物化合理化的过程看成是资本主义现代化的过程。阿多诺延续了卢卡奇的理路, 采用工具合理性分析进路, 把资本主义现代化理解为物化合理化。哈贝马斯从双重合理性出发, 从生活世界和系统双重合理化及其关系层面考察资本主义现代化, 延续了韦伯等人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时代诊断的主题, 从而发展了“作为社会合理化”的现代化理论。从韦伯到哈贝马斯, 西方学界已经形成了一种“作为社会合理化”的现代化理论传统。这为我们理解资本主义现代化及其病症, 以及坚持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一些理论启示。

**关键词:** 现代化理论; 韦伯; 卢卡奇; 阿多诺; 哈贝马斯

中图分类号: C09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104(2024)06-0023-10

韦伯从社会合理化角度对资本主义现代化进行了思考, 提出了文化合理化为什么只发生在西方社会这一问题<sup>[1]</sup>。哈贝马斯受韦伯影响, 认为现代化这个术语主要来源于韦伯的作品, 他明确指出现代化“这个术语表示这样一种理论立场, 即它开始讨论韦伯所提出的问题”<sup>[2](2)</sup>。在哈贝马斯看来, 自韦伯以来形成了一种“作为社会合理化”<sup>[3](209)</sup>的现代化理论传统, 该理论传统解释了西方现代化独特的演变路径, 提供了从合理性<sup>①</sup>、行为理论和社会合理化等方面分析资本主义现代化的视角。依照哈贝马斯的致思理路, 笔者认为从韦伯、卢卡奇、阿多诺到哈贝马斯, 西方理论界存在一种“作为社会合理化”的现代化理论传统。本文采用一种梳理理论史的研究方法展开对该理论传统的研究, 以便更好地了解该理论传统的发展历程、基本观点以及对资本主义现代化问题做出的时代诊断。这为我们理解“作为社会合理化”的现代化理论以及坚持中国式现代化具有一定的理论启示。

## 一、“作为社会合理化”的现代化理论的缘起

韦伯把合理性及其行为整合到对社会合理化的分析中, 工具行为概念是他分析社会合理化过程的基础。当然, 韦伯把合理性行为概念主要理解为狭义的工具合理性行为, 该行为优先于价值合理性行为, 他把资本主义现代化的过程看成是单面的工具合理性制度化以及社会行为合理化的过程。在此基

收稿日期: 2024-01-13; 修回日期: 2024-07-08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哈贝马斯的现代化理论及其当代价值研究”(24BKS169)

作者简介: 刘光斌, 男, 湖南洞口人, 哲学博士, 湖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 国外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联系邮箱: liuguangbin2006@163.com

基础上,他展开了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时代诊断,揭示出这种单面合理化所带来的自由丧失和意义丧失的时代病症。

首先,韦伯采用行为理论分析社会合理化。韦伯把行为分为四种类型:工具合理性行为、传统行为、情绪行为和价值合理性行为<sup>[4](114)</sup>,他主要分析了工具合理性行为和价值合理性行为。工具合理性行为是一种与选择的合理性相关的行为,人们“完全理性地考虑并权衡目的、手段和附带后果”<sup>[4](115)</sup>,并在有一系列可供选择的手段和不同目的的情况下,选择适当的手段去实现确定的目标。价值合理性行为与宗教思想、世俗理想等价值理想信念有关,由于人们能够“将这些价值观念一以贯之地体现在具体的行动进程中”<sup>[4](115)</sup>,因此,人们能够较好地协调手段和目的的关系并采取合理的行动计划。区分工具合理性行为和价值合理性行为的重要依据是:行为者是把重点放在成功实现价值观念上,还是把重点放在实现某个既定目的上。如果行为者把重点放在成功实现价值观念上,那么就是价值合理性行为;如果把重点放在实现某个既定目的上,那么就是工具合理性行为。两者看待价值和目的之间关系的不同,决定了采取的手段有所不同,工具合理性行为需要人们采取最能实现目的的手段,价值合理性行为需要人们采取的手段符合价值观念的要求。韦伯在分析资本主义现代化或社会合理化时,把工具合理性行为置于价值合理性行为之上,把社会合理化主要看成是工具合理性行为合理化。由于韦伯主张工具合理性行为优于价值合理性行为,这就意味着在传统社会制度的合理化过程中工具合理性行为取得优先地位,从而为个人对自身利益的追求提供了更广泛的范围。韦伯认为工具合理性及其行为的制度化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以市场和现代国家形式表现出来,人们对经济利润的分析以及对行政运行效率的分析都符合工具合理性的要求。总之,工具合理性及其行为取得制度化形式,并在经济发展和国家运行中逐渐占主导地位。这既是社会合理化的过程,也是资本主义现代化的过程。

其次,韦伯把社会合理化过程视为现代化过程。韦伯认为社会合理化过程表现为工具合理性及其行为合理化过程,也是资本主义现代化的过程。韦伯把资本主义的发轫看成是工具合理性的应用所产生的合理化过程,这一过程始于文化合理化并扩展至社会合理化,表现为工具合理性的蔓延及其制度化的过程。一是韦伯认为新教职业伦理和现代法律在现代化发轫之际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是一个文化合理化的过程。“宗教——形而上学世界观的解神秘化”<sup>[3](180)</sup>是文化(世界观)合理化的过程,促使人们的认知潜能得到释放,从而形成现代意识结构,这有利于工具合理性蔓延至经济领域和政治领域,并借助法律实现制度化。二是韦伯认为现代化发轫于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的分化,实质上是工具合理性行为的制度化,这是一个社会合理化的过程。韦伯认为社会合理化的过程既是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的分化过程,也是工具合理性行为在资本主义企业和现代国家机构中的渗透过程。哈贝马斯把这一过程解释为工具合理性取得“普遍的制度化”<sup>[3](210)</sup>的过程。三是韦伯指出资本主义现代化表现为从文化合理化向社会合理化转化的过程。一方面,韦伯认为社会现代化开始于文化合理化。“独立文化价值领域的分化在资本主义发生阶段是非常重要的”<sup>[3](233)</sup>,因为随着世界观的解神秘化以及新教伦理的出现,上帝的世界观向理性的合理化世界观转化,资本主义社会通过文化合理化使人的认知潜能现代社会得到释放,这有利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发轫。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现代化发轫之后,现代化表现为从文化合理化转向社会合理化。哈贝马斯指出:“目的理性行为亚系统的独立则是资本主义社会在18世纪后期发展过程中所特有的。”<sup>[3](233-234)</sup>这表明资本主义的社会合理化发生在文化合理化之后。韦伯指出资本主义现代化表现为从文化合理化走向社会合理化的过程,放弃了带有价值解释倾向的文化合理化,从而把资本主义现代化的过程主要视为工具合理性扩张和社会合理化的过程。

最后,韦伯对资本主义现代化进行了病理学诊断。韦伯把资本主义现代化与社会合理化结合起来分析,也把现代化与病理学的时代诊断结合起来分析。韦伯指出,资本主义经济、官僚体系的形成以及日常生活的合理化,导致了资本主义现代化的两大主要病症:人的意义的丧失和自由的丧失。韦伯

从两个方面进行了分析：一是从文化合理化角度指出了人的意义的丧失的病症。韦伯用资本主义精神解释了早期资本主义的发展，他认为随着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推进，宗教对于人们生活形式的决定性作用逐渐式微，宗教提供给人们行为的理由逐渐被行为的合理化形式取代，资本主义社会朝着工具合理性行为合理化的方向发展，资本主义精神演化为理性的设计和价值中立。从韦伯的角度看，随着世界观的解神秘化，祛魅的过程导致艺术、科学与道德分离，每个文化领域遵从自己的发展逻辑，宗教无法发挥文化领域的整合功能，也很难发挥整合文化成员行为的作用，现代生活的意义主要来自个人的自我选择。按照韦伯的说法，原来先知或救世主能够回答人类生存的“终极”问题，现在由于社会存在相互竞争的价值领域，不同的价值观之间存在冲突，具有不可调和性，难以解决人类生存的终极问题。文化合理化导致不同价值领域之间出现一系列的冲突，价值领域相互竞争，彼此之间不再相互兼容，行动者受不同价值观的影响，产生了不可克服的多元价值冲突，导致人的意义的丧失。二是从社会合理化角度解释人的自由的丧失的病症。韦伯指出，随着社会合理化的进一步推进以及目的行为的扩张，整个社会就像一个巨大的铁笼一样逐渐地控制了所有人的生活，日常生活的组织化最终导致人的自由的丧失。韦伯所说的自由是指人们选择自己行为的自由，但随着资本主义现代化的不断推进，不断增长的行为的合法化以及官僚的组织化，越来越多地限制了个人选择的可能性。社会合理化使得所有的制度领域都呈现出通过社会关系实现的去个性化，经济和国家的出现强化了对人的控制，人们通过不断提高的技术强化对自然和社会的支配，导致人的自由的丧失。

韦伯倾向于在工具合理性行为合理化基础上解释社会合理化，进而分析资本主义现代化，把文化合理化看作是社会的工具合理性行为合理化的一个因素。但是他并没有把文化合理化视为社会发展的动力，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韦伯的合理化观念是片面的。韦伯在对现代理性铁笼的描绘中隐含了对社会合理化的批判。韦伯注意到现代社会的进步、成熟社会实施的工具控制，也看到一个日益集权化和官僚化的社会对人性的压制。他把现代社会的进步、资本主义国家的进步和成熟社会实施的控制结合在一起进行考量，指出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病症，对资本主义社会“铁笼”的形象比喻反映了他对现代社会解放的可能性持悲观态度。韦伯一方面接受了合理化带来的好处，另一方面也接受了无法解决的现代化问题。由此可见，韦伯对资本主义现代化持矛盾的态度，一方面他并不拒绝资本主义现代化，不拒绝社会合理化的发展，另一方面他清楚地意识到这种发展所导致的病症，且没有办法在现代社会之外寻找解决问题的替代方案。尽管如此，韦伯从社会合理化角度考察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研究思路，对资本主义现代化作出的有关人的自由的丧失和意义的丧失的时代诊断，对后来的研究者们产生了重要影响。卢卡奇、阿多诺、哈贝马斯等人推进了从合理化角度考察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研究，其中，哈贝马斯明确指出，韦伯最早提出了“作为社会合理化”<sup>[3](227)</sup>的现代化理论。

## 二、“作为社会合理化”的现代化理论的赅续

哈贝马斯指出，韦伯“对社会关系的物化(作为官僚化的后果)表示担忧”<sup>[3](142)</sup>。事实上，韦伯的物化观点以及对作为社会合理化的现代化的分析对卢卡奇、阿多诺产生了影响，其中“韦伯的资本主义合理化概念对卢卡奇的物化理论的影响则更加明显”<sup>[5](117)</sup>。卢卡奇和阿多诺重新思考了合理性概念，把工具合理性作了形式合理性的阐释，并对商品结构进行了分析，通过物化概念来重新理解社会合理化。他们把韦伯的社会合理化理论解释为物化合理化理论，着重分析了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物化病症，从而赅续了“作为社会合理化”的现代化理论。

卢卡奇将社会合理化设想为形式合理性的胜利。“根据卢卡奇的观点，这种形式合理化作为现代

化对应于一种抽象分析的合理性”<sup>[5](186)</sup>，他把形式合理性放到商品结构中进行分析，进一步揭示了资本主义的物化合理化。卢卡奇把韦伯的工具合理性看成是形式合理性，重视精确的、定量的计算，基于这种计算的行为遵循“根据计算，即可计算性来加以调节的合理化的原则”<sup>[6](149)</sup>。这种合理化原则的“最纯粹形式”存在于现代资本主义的商品形式中。卢卡奇明确指出：“商品的商品性质，即抽象的、量的可计算性形式表现在这种性质最纯粹的形态中。”<sup>[6](156)</sup>形式合理性以最纯粹的形式出现在商品结构中，而商品结构则是物化的来源。卢卡奇认为商品问题与资本主义社会各个方面的问题密切相关。事实上，商品是资本主义的核心，资本主义社会的所有问题都可以追溯到商品及其商品结构，因此，应该在典型的现代资本主义的商品结构中探讨物化问题。卢卡奇指出：“商品结构的本质已被多次强调指出过。它的基础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获得物的性质，并从而获得一种‘幽灵般的对象性’……掩盖着它的基本本质，即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所有痕迹。”<sup>[6](143-144)</sup>卢卡奇对商品结构本质的分析表明他从商品结构出发揭示了物化的来源。他将资本主义社会的物化现象描述如下：“经济形式的拜物教性质，人的一切关系的物化，不顾直接生产者的人的能力和可能性而对生产过程作抽象合理分解的分工的不断扩大。”<sup>[6](156)</sup>基于卢卡奇关于物化现象的观点以及相关论述，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分析其物化观点。

一是作为商品拜物教的物化。卢卡奇认为马克思商品拜物教的概念包含着物化的内涵，商品拜物教是“物化的基本现象”<sup>[6](147)</sup>，几乎所有其他的物化现象都可以由此衍生出来。根据马克思商品拜物教理论，商品的经济价值被认为是成为商品的物质的东西，作为交换，参与者把商品的社会属性置于商品中，这样，人们并不重视构成商品价值的社会关系，反而重视商品的交换价值，并认为它是商品本身所固有的。卢卡奇从商品拜物教的角度分析了两个方面的物化内涵：一方面将人的纯粹社会现实性的属性和关系归结为作为物的商品，以至于个人认为自己的行为是由数量法则支配的社会决定的。另一方面将资本主义社会看成是不可变的，其规律可以被理解，能够被人们利用却不能从根本上加以改变。

二是作为社会关系的物化。卢卡奇认为商品拜物教是“物化的基本现象”<sup>[6](147)</sup>，从商品结构出发揭示了物化的来源，解释了经济领域的物化现象。仅仅如此，不足以把整个资本主义现代化解释为物化合理化，卢卡奇还需证明在资本主义统治下所有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是物化的。卢卡奇认为这与商品形式已经成为“整个社会存在的普遍范畴”<sup>[6](146)</sup>有关。他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的商品形式已经能够“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并按照自己的形象来改造这些方面”<sup>[6](145)</sup>，也就是说，经济领域的物化现象渗透至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依据合理化原则调节人们的行为，因此卢卡奇所说的合理化就是物化合理化。比较典型的是行政领域的物化，卢卡奇将这种经济领域的物化模式扩展到行政领域，认为行政领域同样遵从了物化合理化原则。卢卡奇写道：“宁可说，二者在基本本质上是完全一样的。从社会科学上看，一个‘企业’就是现代的国家。”<sup>[6](158)</sup>此外，资本主义工业和现代行政管理都体现了理性计算的精神，遵循了物化逻辑。卢卡奇从商品结构出发揭示了物化的来源，把物化看成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结果，把物化和经济合理化紧密联系起来，其他领域也都遵从同样的逻辑。用哈贝马斯的话说，“卢卡奇把合理化和物化看作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sup>[3](338)</sup>。卢卡奇认为合理化就是资本主义的合理化，是物化合理化，物化合理化的过程是资本主义现代化的过程。卢卡奇把韦伯的工具合理性看成是形式理性，又把形式合理性与商品、物化的分析联系在一起，从商品和商品结构出发解释了资本主义的物化合理化，并从物化合理化视角考察了整个资本主义现代化。

三是作为劳动力的商品化及其分工带来的物化。卢卡奇研究了资本主义劳动过程中理性的、精心设计的分工和有效的组织所产生的后果。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由于分工导致劳动者的劳动在劳动过程中“支离破碎”且不受劳动者支配，从而使劳动产品作为一种商品与劳动者之间没有明显的联系。

卢卡奇注意到分工造成劳动者个人的劳动能力与他或她的个性相分离,机械的、标准化的重复生产导致人的属性被排除在劳动过程之外。卢卡奇指出,一旦劳动力成为一种商品,像其他商品一样可以买卖,一旦劳动者的能力和特性表现为“人‘占有’和‘出卖’的一些‘物’,像外部世界的各种不同对象一样”<sup>[6](164)</sup>,那么劳动力的商品化及其使用过程中的分工将带来物化。卢卡奇认为,在资本主义劳动过程中,劳动者的劳动能力变得和任何生产资料、工具一样,可以进行计算。因此,劳动者不能成为劳动过程的“真正的主人”<sup>[6](150)</sup>,“而是作为机械化的一部分被结合到某一机械系统里去”<sup>[6](150)</sup>,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劳动者仅仅是机器的附属物。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带来了劳动者的“非人化”,在此意义上看,人的劳动能力物化了。

阿多诺接受了卢卡奇的物化批判与形式合理性批判的观点,他比卢卡奇更明确地将资本主义现代理解物化的合理化。不同于卢卡奇的是,阿多诺把形式合理性视为工具合理性,把物化合理化解释为“理性对自然的支配”<sup>[7](207)</sup>而出现的社会形式和构成这些社会形式基础的同时性原则。不仅如此,阿多诺还主张物化问题不仅与资本主义现代化有关,而且与整个支配自然的历史有关。

一是阿多诺以工具合理性解释资本主义现代化。阿多诺在启蒙与神话的纠缠关系中以工具合理性解释资本主义现代化,并认为这是一个社会合理化的过程。阿多诺认为,启蒙用形式化的工具合理性取代神话,并把工具合理性与自我持存的观念结合起来考察。启蒙的工具合理性促进了社会合理化,表现为人们用工具合理性改造自然转向用工具合理性控制社会中的人,这个过程是一个启蒙摧毁神话及推进资本主义现代化的进程。当社会合理化与自我持存结合起来的时候,阿多诺注意到启蒙在战胜神话的过程中自身成为新的神话,启蒙的工具合理性成为统治手段。在从启蒙工具合理性的手段和目的的关系角度考察人的自我持存与自然关系时,人们关心的是如何获得某物以便更好地自我持存,而当考察人的自我持存与社会(人的关系)时,人们考虑的是如何控制自身或他人以便更好地自我持存。前者表明工具合理性的运用使控制自然的行动者与自然相异化,后者表明工具合理性的应用要求把人视为客体,把人自身和他人看成是要控制的客体,造成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物化。启蒙以工具合理性为基础的社会合理化造成的后果是:自我持存的启蒙工具合理性使人忘记了人本来应该为之活着的意义,启蒙工具合理性变成了自我毁灭,启蒙变成了新的神话。

二是阿多诺把社会合理化解释为物化合理化。社会合理化的过程既是启蒙战胜神话的过程,又是资本主义社会不断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也是人的不断物化的过程。阿多诺用工具合理性解释社会合理化,并进一步把社会合理化解释为物化合理化。阿多诺做了两个方面的理解。一方面,他认为资本主义现代化是作为物化合理化的现代化。具体来说,他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各种物化现象。在经济领域,出现了商品拜物教和劳动力商品化的物化。人类“按照技术装置来塑造自己肉体 and 灵魂的个体产生自我异化”<sup>[7](23)</sup>,主体取消自我意识将自己客体化,以适应生产的需要,导致“人在工厂和机关里的物化”<sup>[7](24)</sup>,由于商品的普遍化,商品交换采取韦伯所说的理性计算,消费者也被物化了。在政治领域,人们用控制自然的方式控制人,出现了采用工具化的政治统治规则。在文化领域,出现了资本主导的文化产业物化。正如波采鲁耶夫所说,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中对现代文化的诊断“与卢卡奇对物化思维的批判出人意料地一致”<sup>[5](128)</sup>。另一方面,他采用工具合理性来解释物化合理性。阿多诺强调理性的方法,定量计算、抽象理解生产者和消费者的标准化行为,把形式合理性这种支配的理性形式扩展到工业劳动组织和社会的其他领域,因此,可以将世界历史视为将工具合理性渗透到经济、国家和文化中的结果。阿多诺认为物化的源头就是理性对自然的支配,他指出,“要想对世界历史的哲学意义上的解释,就必须说明理性对自然的支配是怎样克服所有偏差和障碍逐步取得今天的胜利的”<sup>[7](207)</sup>,理性对自然的支配早于资本主义社会就出现了,因此物化一定比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更早地存在于西方历史中。阿多诺认为“理性对自然的支配”中的理性主要指工具合理性,当人们把理性对自然的支配扩展到人类社会时,社会领域就会出现物化。阿多诺对物化合理化的分析

表明,工具合理性与现代资本主义中的物化形式具有一种内在的亲合力,但并不认为人类历史只有到了资本主义阶段才出现物化现象。由此来看,在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将不可避免地产生物化现象,因为以工具(形式)合理性为基础的社会合理化就是物化合理化。

三是阿多诺分析了物化合理化的同一性原则。阿多诺不仅分析了物化植根于“理性对自然的支配”<sup>[7](207)</sup>而出现的物化合理化,而且分析了物化植根于在他看来构成这些物化合理化的思想形式。阿多诺称这种思想形式为“同一性原则”,当人的思想被工具合理性的思维方式、被同一性的思维控制的时候,人的灵魂就被物化了。阿多诺认为任何判断都符合同一性原则的要求,将一个概念应用于一个对象,就表明这个概念完全捕获或穷尽了这个对象,即它与这个对象是同一的。然而,阿多诺的“否定的辩证法”的中心前提是强调对象的优先性,概念和对象之间具有非同一性,或者说,概念不能穷尽对象。同一性原则关于概念与对象之间的关系反映了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阿多诺主张客体对主体的优先性,并展开对物化的分析。按照阿多诺的解释,“物化本身是虚假客观性的反映形式”<sup>[8]</sup>,或者说,物化就是异化了的主体性获得了虚假的客观性。物化本质上就是客体性的遗忘,表现为概念拜物教,主体以概念中介了客体,实质上坚持了主体对客体的优先性地位。这和商品拜物教存在异曲同工的地方。只要把商品的价值看成是商品的客观属性,那么交换行为就掩盖了所交换物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之间的区别。“交换原则”和“同一性原则”之间存在内在关联:交换原则掩盖了交换物之间的差异,恰如同一性原则遮蔽了概念与对象之间的差异。一方面,在商品交换中,价值以交换价值的形式表现出来,两种商品的价值量要求相等,但这实际上掩盖了它们的价值的差异。根据商品拜物理论,交换价值的纯粹社会属性被看成是商品化的物品的自然属性。因此,商品交换掩盖了它们的价值差异,以及它们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之间的差异。另一方面,根据同一性原则,概念提出了概念与对象之间关系中的捕获或穷尽关系。在上述意义上,交换原则就是“同一性原则”,根据阿多诺的说法,同一性原则构成了交换原则的必要前提,正如哈贝马斯所说:“同一性思想深深扎根于交换关系的形式合理性之中;随着交换价值中介的分化,它才获得了普遍意义。”<sup>[3](362)</sup>因此,交换原则把具体的交换物都抽象为商品,交换中固有的物化可以追溯到同一性原则。阿多诺指出物化和同一性原则之间的联系,认为物化的思想形式源于同一性原则。

### 三、“作为社会合理化”的现代化理论的发展

哈贝马斯指出,韦伯从合理化角度展开对现代化的思考,从工具合理性行为出发考察社会合理化,并把社会合理化过程看成是现代化的过程,因此,资本主义现代化过程是一个作为社会合理化的现代化过程。卢卡奇和阿多诺赓续了韦伯关于现代化的理论,由工具合理性分析转向形式合理性分析,由社会合理化转向物化合理化。在哈贝马斯看来,韦伯等人未能令人满意地解释合理化及其产生的非理性后果,部分原因是他们的行为理论存在缺陷,主要原因是他们对社会合理化做了片面的理解,导致他们把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理解为立足于片面工具合理性的社会合理化过程。对此,哈贝马斯围绕“我们是否可以从合理化的角度来考察现代化过程;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又该如何来考察呢?”<sup>[3](136)</sup>这两个问题,重构了“作为社会合理化”的现代化理论。他认为采用交往行为理论进行考察的话,依然可以从合理化角度展开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思考,但需要把作为单面社会合理化的现代化理论发展为作为双重合理化的现代化理论。

和韦伯一样,哈贝马斯把合理性和行为理论作为社会理论的基础,不同于韦伯的是,他做了一些理论上的修正。哈贝马斯指出韦伯主要探讨了工具合理性行为和价值合理性行为。韦伯主张工具合理性行为优于价值合理性行为,资本主义现代化揭示出来的工具合理性的胜利是以牺牲价值合理性为代

价的。哈贝马斯指出韦伯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分析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因为“马克思、韦伯以及霍克海默和阿多诺都认为，所谓社会合理化，就是指行为关系当中工具理性和策略理性的增长”<sup>[3](142)</sup>。哈贝马斯认为社会合理化并不像韦伯所说的那样是一维的，而是二维的。他在工具合理性(形式合理性)概念之外，发展出一种交往合理性概念。正如“形式合理性”是指在社会制度层面上实现了工具合理性行为中固有的目的、计算、利益导向的理性，哈贝马斯的交往合理性概念是指交往行为中固有的“理性潜能”的解放。哈贝马斯在分析两种合理性的基础上区分了两种类型的社会行为：工具合理性行为和交往行为，前者强调主体通过理性计算以实现自己的目的，后者重视主体间的交往合理性并通过语言媒介达到理解共识。哈贝马斯认为，一个合理化社会必须是理性的，不仅允许经济或政治领域中的工具合理性(形式合理性)和工具合理性行为，而且必须公平地对待生活世界中的交往合理性和交往行为。

哈贝马斯采用双重合理性概念及其行为不仅修正了韦伯的合理性概念和行为理论，而且修正了韦伯的社会合理化理论。哈贝马斯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形成了两个领域的子系统：生活世界和系统。其中，系统包括经济子系统和政治子系统。他主张在生活世界合理化之外，还存在系统合理化，社会既是系统又是生活世界，从而发展出生活世界和系统双重社会合理化模式。首先，哈贝马斯主张构建生活世界的一般或“不变”结构，以此为基础构建一个社会合理化的理论。他指出：“我们将从交往理性概念入手，对生活世界的结构加以研究；对于个体和集体而言，有了生活世界的结构，也就有了合理行为的指南。”<sup>[3](43)</sup>哈贝马斯认为“生活世界”的结构由社会、文化和个人三个方面构成。一是社会，主要是指社会的制度秩序。哈贝马斯认为合法的制度和秩序能够调整属于社会群体中的人们行为，从而增加人们对社会的归属感，实现社会整合。二是文化，文化在生活世界中主要作为解释系统，文化主要指塑造行为者的解释方案和价值标准的文化传统。文化“构成了社会群体的背景知识，并且确保其各种行为取向之间能有一种内在的联系”<sup>[3](44)</sup>。三是人格，指主体在语言能力和行动能力方面具有的资格，交往行为不但促进社会的教化，而且有利于个人自我观的建构。哈贝马斯不仅分析了生活世界的结构，还解决了生活世界三个组成部分如何合理化的问题。哈贝马斯认为文化传统、制度结构和个人人格是不断变化的，交往行为解释了作为生活世界的社会是如何得以维持的。当互动中的参与者彼此理解自己的处境，处于相同的文化传统中，通过对可批评的有效主张的主体间认识来协调行为；个人在与共同体成员互动的过程中内化了社会群体的价值取向，获得了广泛的行为能力。因此，与社会、文化和人格的结构相对应的是社会整合、文化复制和社会化的过程。生活世界合理化揭示了从交往合理性、交往行为到社会整合这一社会合理化过程。其次，哈贝马斯认为伴随着生活世界合理化，出现了系统分化及其合理化。系统主要是指经济子系统和政治子系统。系统借助金钱和权力媒介在合理化的过程中从生活世界中脱离出来，经济和科层机构的功能独立于生活世界，它们的行为机制从语言的调节媒介转向金钱和权力媒介，遵循工具合理性的内在逻辑，反映的是单主体与世界的关系。从系统合理化的角度看，社会作为一个系统整体的合理化表现为政治系统和经济系统合理化过程，社会进化是一个过程，系统越来越复杂化，金钱和权力成为协调行为的重要媒介进行系统整合。系统合理化揭示了从工具合理性、工具合理性行为到系统整合这一社会合理化进程。由此可见，哈贝马斯实际上和韦伯一样，是基于工具合理性来理解系统及其合理化的。

哈贝马斯不仅从系统和生活世界双重合理化角度解释了资本主义现代化过程，而且从系统和生活世界的相互关系中揭示了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病症。在哈贝马斯看来，资本主义现代化的过程是系统和生活世界双重合理化的过程，也是系统与生活世界相互分离的过程，两者的分离取决于生活世界的优先发展，使现代的价值体系和行为成为可能。这将产生两种可能的影响。一方面，哈贝马斯把系统与生活世界的分离看成是一种“卸荷”机制，这种分离对于社会合理化而言是必要的。随着生活世界的合理化，社会复杂性问题凸显出来，生活世界不能处理所有的任务，必须依靠简化程序维持社会整合。

像金钱和权力这些媒介借助可计算的价值数量关系,可以绕过语言发挥影响力,也就是说,系统从功能上弥补了生活世界的不足。在哈贝马斯看来,社会合理化将从生活世界合理化和系统合理化两个方面展开,彼此按照合理化的内在逻辑在自己的范围和界限内运行。另一方面,哈贝马斯认为,系统与生活世界的分离也导致了系统可能取代生活世界的风险。这将导致生活世界的殖民化,即系统对生活世界的入侵,导致生活世界难以实现再生产。具体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文化层面的意义丧失。文化再生产的功能是确保传统的连续性和知识的一致性,以满足日常实践。在文化领域,与文化再生产相对应的危机倾向表现为人的“意义的丧失”,并对生活世界其他两个组成部分产生影响,导致社会合法性的缺失和个人行为价值取向危机<sup>[9](161)</sup>。二是社会层面的社会整合的失败。社会整合的功能是通过人际交往关系来协调人们的行为,并确保人们在日常实践中获得群体的身份认同。这些功能的履行情况可以根据社会成员以及其组成群体之间的团结程度来加以评估。社会整合过程的失败,意味着在社会领域内,出现社会反常;在文化领域内,导致人们的社会身份受到威胁;在人格领域内,导致个人的异化。社会整合失败意味着社会团结变得越来越缺乏。三是个人层面的自我认同的缺失。个人层面出现了社会化危机,出现了人格领域内的精神病理;在文化领域内,导致文化传统遭到破坏;在社会领域内,造成社会制度成功运行所需动机的匮乏。哈贝马斯分析资本主义现代化病症的出发点是系统合理化的程度及其对生活世界的影响。生活世界变形产生的病理表现为失去意义、失范和精神病理,现代社会中系统合理化占据优先地位,系统功能上的入侵造成生活世界的混乱或危机。正如丹内所说:“哈贝马斯认为,将经济和非经济的现代化过程‘辩证地’描述为理性的成长以及与此相伴的苦难史,是一项有着广阔前景的研究课题。”<sup>[5](73)</sup>在这项课题中,生活世界对沟通理解的需求被一个系统的功能需求所取代,实际上是一个社会去人性化的过程,也就是指社会物化,因此,“哈贝马斯通过‘集中重建物化原理’来重建批判理论,并不令人意外”<sup>[5](73)</sup>。在哈贝马斯看来,系统对生活世界的入侵就是物化,“这一探索的核心就是将现代化进程中的体系和生活世界脱离开来”<sup>[5](73)</sup>。在这里,哈贝马斯对物化概念作了一种新的解释。

#### 四、“作为社会合理化”的现代化理论评析

西方学界存在诸多关于现代化的理论,诸如,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拉美的依附理论、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罗斯托的经济成长阶段论,等等,但从行为理论及其合理化角度深入分析资本主义现代化并进行时代诊断的现代化理论不多。我们认为韦伯等人重视这方面的研究,并且已经形成了一种“作为社会合理化”的现代化理论。该理论具有两个方面的意义。

第一,“作为社会合理化”的现代化理论为研究资本主义现代化提供了理论资源。从韦伯到哈贝马斯,“作为社会合理化”的现代化理论经历了最初的产生、理论的赓续到进一步的发展,已经形成了一种研究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理论范式,取得了一些理论共识。一是以合理性概念为基础。韦伯主张对工具合理性等合理性类型进行分析,卢卡奇、阿多诺也使用了工具合理性概念,哈贝马斯则强调对工具合理性和交往合理性进行区分。事实上,韦伯认为随着宗教观的祛魅,确立了现代意义上的合理性概念。此后的卢卡奇、阿多诺、哈贝马斯和韦伯一样,都主张应该立足合理性概念考察资本主义现代化问题。二是以行为理论为特征。韦伯考察工具合理性行为及其制度化,卢卡奇考察物化行为及其制度原因,阿多诺考察经济领域行为和物化现象,哈贝马斯对工具合理性行为和交往行为的区分都与“作为社会合理化”过程中的人的行为有关,从行为理论视域考察资本主义现代化成为这一理论的共同特征。三是以社会合理化为标识。韦伯从文化合理化转向社会合理化,卢卡奇和阿多诺把社会合理化解释为物化合理化,哈贝马斯强调生活世界和系统双重社会合理化,他们都把社会合理化与资本主义现代化

的进程结合起来，社会合理化成为他们的现代化理论的标识。四是以时代诊断为视角。该理论传统对资本主义现代化采取了时代诊断的视角，适用于韦伯所处的时代诊断，同样适用于当代的时代诊断。该理论采用批判立场考察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問題，把意义的丧失、自由的丧失以及物化现象看成是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病症，揭示了资本主义不同时期的病症表现。总之，该理论构建了一个把合理性概念、社会行为理论、社会合理化和社會病理学诊断整合为一体的理论范式。

第二，“作为社会合理化”的现代化理论为打破“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提供了一些启示。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科学的、艺术的、政治的或经济的发展没有在印度、在中国也走上西方现今所特有的这条理性化道路呢？”<sup>[10]</sup>韦伯认为新教伦理(印度和中国不具备)使西方走上了特有的合理化道路，因此，作为社会合理化的现代化理论立足于西方社会也只适合解释西方社会。哈贝马斯认为韦伯的这个问题是一个“世界史问题”<sup>[2](1)</sup>，他结合欧洲现代化进程，指出资本主义现代化的产生具有或然性，是“一种或然性的模式”<sup>[3](139)</sup>。笔者认为韦伯、哈贝马斯关于西方现代化是一种或然性的模式的论断，表明他们对作为社会合理化的现代化的产生及其适用范围进行了思考，但他们并不认为西方现代化是唯一模式，也不主张其他国家必须以西方现代化作为衡量现代化的水平与标准。这带给我们的启示是西方现代化的出现具有或然性，不具有普遍适用性，现代化不等于西方化，必须打破“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我国必须坚持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必须认识到中国式现代化是不同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新的理论形态。

当然，“作为社会合理化”的现代化理论虽然为人们提供了一种理解现代化的理论范式，但也要注意该理论存在的一些问题。第一，该理论传统内部的理论家之间的观点存在一些分歧。主要表现在对合理性概念的理解和行为理论的分析方面存在争论，对合理化的理解和考察视角上也存在差异，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病症及其原因的分析上也存在较大分歧等。第二，该理论看不到工具合理性带来的解放潜能。韦伯、卢卡奇、阿多诺、哈贝马斯把工具(形式)合理性看成是社会合理化的动力，是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核心。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看，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力是社会变革的根本力量，有利于实现人的解放和发展。韦伯等人的工具理性观强调了生产力的决定作用，认为“人用处理自然的方式(生产力)来处理自己所面对的他人(生产关系)”<sup>[11]</sup>，这是对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一种庸俗的历史唯物主义解释，且他们把工具合理性看成是对自然和人的统治，看不到工具合理性带来的人的解放潜能。第三，该理论难以解决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病症。韦伯等人展开了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批判，重视工业文明带来的危机，都注意到工业文明和合理化过程中人受物的奴役、生产者隶属于产品等后果，但他们没有意识到工具合理性的资本逻辑是产生资本主义病症的内在原因。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强化了资本主义统治关系，这是导致韦伯和阿多诺对解决工业文明的统治现象和病症深感忧虑却又找不到出路的根源。哈贝马斯试图平衡系统和生活世界的关系，也只是在资本主义内部寻找解决资本主义现代化病症的方案，这与马克思提出的替代资本主义的解决方案不同，因此，难以找到摆脱资本主义现代化困境的出路。

## 注释：

① 理性(reason)概念和合理性(rationality)概念经常被混在一起使用，一般现代哲学用理性(reason)概念，社会学理论用合理性(rationality)概念。哈贝马斯对合理性概念的分析受韦伯影响，他说：“合理性概念在分析社会合理化的现代过程中可以把有限的目的理性当作主导观念。韦伯、马克思以及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所使用的都是这个概念。”(《交往行为理论》第142页)。哈贝马斯在元理论、方法论和经验论三个层面上使用合理性(rationalität)概念。(《交往行为理论》第7页)。他主要从认知意义上使用合理性概念：“我还是坚持严格认知意义上的合理性概念，这种合理性概念所涉及的只是对所描述性知识的具体应用。”(《交往行为理论》第10页)。本文使用社会学理论的合理性概念，接受哈贝马斯对合理性概念的理解，探讨合理性概念和社会理论之间的内在联系，分析“从何种意义上讲社会现代化堪称是合理化”(《交往行为理论》第4页)的问题。

**参考文献:**

- [1] WEBER M. 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M]. PARSONS T, tran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5: 38.
- [2] 哈贝马斯. 现代性的哲学话语[M]. 曹卫东, 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4.
- [3] 哈贝马斯. 交往行为理论: 行为合理性与社会合理化[M]. 曹卫东,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4.
- [4] 韦伯. 经济与社会(第一卷)[M]. 阎克文,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9.
- [5] 孙乐强, 李乾坤. 物化与革命: 《历史与阶级意识》中的马克思主义理论[C]//张亮. 卢卡奇研究指南: 第二卷.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22.
- [6] 卢卡奇. 历史与阶级意识: 关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研究[M]. 杜章智, 任立, 燕宏远,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6.
- [7] 霍克海默, 阿道尔诺. 启蒙辩证法: 哲学断片[M]. 渠敬东, 曹卫东,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 [8] 阿多尔诺. 否定的辩证法[M]. 张峰, 译. 重庆: 重庆出版社, 1993: 188.
- [9] BAXTER, WALLACE H. Critical theory and the rationalization of society[D].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1985.
- [10] 韦伯.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 于晓, 陈维刚, 等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7: 15.
- [11] 王晓升. 走出现代性的困境: 法兰克福学派现代性批判理论研究[M].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21: 174.

## **Modernization theory of "Rationalization as the Society": From Weber to Habermas**

LIU Guangbin

(School of Marxism, Hunan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2, China)

**Abstract:** When investigating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and its institutionalization, Weber combines behavioral theory with social rationalization theory, regards the process of social rationalization as the process of capitalist modernization, and starts the era diagnosis of capitalist society, hence opening the theoretical tradition of modernization as social rationalization. Lukacs and Adorno continue the tradition of modernization theory of "Rationalization as the Society": Lukacs absorbs Weber's rationalization theory, and regards the process of materialization rationalization as the process of capitalist moderniz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ormal rationality, while Adorno continues Lukacs's logic, analyzes the materialized social form, materializes ideological form, and criticizes the materialized symptoms of capitalism. Then, Habermas, starting from the dual rationality, examines the capitalist modernization from the dual rationalization of life world and system and their relationship, which continues the theme of Weber and others' diagnosis of capitalist society, thus developing the modernization theory of "Rationalization as the Society". From Weber to Habermas, western academic circles have formed a theoretical tradition of modernization as social rationalization, which provides some theoretical enlightenments for us to understand capitalist modernization and its symptoms and adheres to Chinese modernization.

**Key words:** modernization theory; Weber; Lukacs; Adorno; Habermas

[编辑: 胡兴华]